

# 五柳與孤松

## ——陶淵明的文化偶像與魏晉風度

劉奕\*

〔摘要〕

陶淵明與嵇康、孫綽、張湛的關係，是過去學者較少注意的。實則嵇康可以視為陶淵明的「文化偶像」，陶淵明對柳的喜好應源自嵇康；而陶淵明對孫、張二氏大概也心有戚戚焉，他在家園中種松則應是效法二人。正是通過陶淵明，柳樹在後世凝固了隱逸這一意象。也是因為陶淵明，在家園中種松從不吉利的事變成一種風雅行爲。通過柳與松的鏈接，也可以較深入透視嵇康等人在文學與思想上對陶淵明產生的具體影響。最後，審視陶淵明與柳和松的關係，也可以附帶肯定〈五柳先生傳〉是其少作這一傳統說法。

關鍵詞：五柳、孤松、嵇康、孫綽、張湛

---

\*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吾國先哲，高情雅意，常託興山川草木，所以人物風流，交相輝映。陶淵明的風神，在草卉，有寄於菊花；在喬木，則最契於柳、松。柳與松，同樣是魏晉士人所欣賞的樹木，但姿態習性迥異，所呈現的風貌不同，進而與雅人名士也各有緣法，最後形成自己的文化史意蘊。從文化史的角度審視陶淵明與松、柳的關係，既能透過魏晉風流更好地理解陶淵明的人生意趣、思想淵源，更能發現陶淵明灌注給柳與松的文化史的新意蘊。

以柳而言，其隱逸的象徵意蘊，恐怕托始於嵇康，陶淵明寄情柳樹，當是向自己的文化偶像嵇康「致敬」。相較於柳樹，陶淵明與松的關係則似未見人提及。松的文化與意味在漢魏晉間頗有發展，早先松之象徵，兼有長生與死亡正反二義，至東晉，又因死亡而轉入任誕，孤松之於陶公，正是其人任誕孤傲之氣的寫照。而將興於柳和托於松結合，又能看出陶淵明心境與思境的變遷，也能佐證〈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時間。

## 一、柳與五柳

徐公持先生曾在〈理極滯其必宣——論兩晉人士的嵇康情結〉一文中較為詳細地梳理了嵇康在兩晉文士中的巨大影響，指出「嵇康情結」實為兩晉時期特殊文化心理現象<sup>1</sup>，所論甚確。遺憾的是，徐文偏偏漏了陶淵明不談。李劍鋒先生著有專著《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歷數陶淵明的思想、文學淵源，於嵇、陶關係，僅在論及四言詩時提到：「陶淵明的四言詩在精神上汲取了仲長統、曹操、王粲、陸機、嵇康等人抒寫自我的新志向、新情思和新清癯……嵇康的四言詩已經有物我一體的玄趣，除了將日常生活情趣化外，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嵇康對陶淵明的深刻影響。」<sup>2</sup>李說固善，然未盡、未探本抉原。其實陶淵明對嵇康是很崇拜的，他的思想與生活姿態常有與嵇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處。

陳寅恪先生曾撰〈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主張嵇康、阮籍所持是肯定自然而反對名教的舊自然說，而陶淵明所持則是自然、名教兩棄而主委運

<sup>1</sup> 徐公持：〈理極滯其必宣——論兩晉人士的嵇康情結〉，《文學遺產》1998年第4期，頁36-45。

<sup>2</sup> 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17。

順化的新自然說。<sup>3</sup>雖然自然之說有新舊之別，但陶淵明的態度與文字，「實一種與當時政權不合作態度之表示」，這一點與嵇康正相一致。所以，嗜酒閒居，不問政治，雖然與阮籍、劉伶等相似，而「如詠荆軻詩之慷慨激昂及讀山海經詩精衛刑天之句，情見乎詞，則又頗近叔夜之元直矣。」<sup>4</sup>在指示嵇康、陶淵明易代同悲的心曲上，陳先生所論可謂切中肯綮。

嵇、陶在思想、個性、精神以及文學上的承遞，實有多端，其跡可按而繹之。陶淵明〈形影神〉三首，分別形、影與神，其淵源，據遼欽立、王叔岷、車柱環、楊勇、袁行霈諸先生考察，可在《莊子》、司馬遷、王充、桓譚、《列子》、慧遠諸人諸書處發現，但嵇康被諸先生失之眉睫之前了。《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sup>5</sup>嵇康的前兩論，當時影響之大可知。其中〈養生論〉即區分形、神，謂：「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中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中略）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sup>6</sup>雖然陶淵明並不追求長生，不主養生，但他在〈神釋〉中所說「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之意，與嵇康以神為本，以形為末，崇本以息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的主張，還是一致的。更有意味的相似表現在對自我的安頓與個性堅持上。余敦康先生在《魏晉玄學史》中指出，嵇康認為自我是相對的、有哀樂之情的小我，主張克制自我，超越自我，而與和諧無限的宇宙本體合一，可是在與現實對抗時，嵇康偏偏不能克制自我，而是堅持個性以相抗衡，結果充滿矛盾與痛苦。<sup>7</sup>直到「他面臨死亡，卻是從容、鎮靜、安詳，表現了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崇高風範……他那孤傲狷介的獨特的個性處處與現實生活相抵觸，最後卻在他終生真誠追求的自然之和的宇宙本體中得到了確認。這是嵇康的悲劇，也正是嵇康的偉大」。<sup>8</sup>蕭馳先生也注意到嵇康的這兩面，他以沖和與峻潔標舉之，并特別

<sup>3</sup>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01-229。

<sup>4</sup> 同前註，頁227。

<sup>5</sup> 〔南朝宋〕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89。

<sup>6</sup> 〔晉〕嵇康撰，戴明陽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53。

<sup>7</sup> 余敦康：《魏晉玄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16-322。

<sup>8</sup> 同前註，頁322-323。

提出：「清人沈德潛論唐詩人得陶詩者，以韋應物得其沖和，柳宗元得其峻潔。陶詩此兩面，即叔夜人格與詩格的兩面。」<sup>9</sup>蕭先生的論斷提醒我們，陶淵明的人格與詩格與嵇康何其相似乃爾，陶公面對死亡的風度又何嘗不是嵇康式的從容瀟灑呢？魏晉人物，以嵇康與陶淵明是最相似的吧。

本此以審視陶淵明詩文，會發現他的確時時在向嵇康「致敬」。如〈停雲〉「安得促席，說彼平生」，〈時運〉「清琴橫膝，濁酒半壺」，〈詠二疏〉「促席延故老，探觴道平素」，還有〈歸去來兮辭〉中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以及〈雜詩〉其四「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五處詩文，其實都化用自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的語典。〈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好朋友山濤推薦嵇康出來做司馬氏的官這件事已發生二三年之後寫的，如真要絕交，無需等待這麼久。誠如徐高阮先生在〈山濤論〉中所說：「是嵇康假借了一個沒有實在意義的謝絕推引的題目，針對眼前時勢而發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裡所說的種種很不中聽的不堪任官的理由，顯然只是爲了托出『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這一句最激烈的譏刺。」<sup>10</sup>所以，嵇康所謂「今但願守陋巷」云云，不是單純對隱居的嚮往，而是從反面表達了政治不合作之意，隱居與政治反抗，正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陶淵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化用嵇康此說，難道只取其隱逸之意而無反抗之心嗎？顯然不是，陶淵明對晉末官場固然不屑，他對先後篡權的桓玄、劉裕又何嘗假以顏色？桓玄篡位後不久，陶淵明就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中說「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不合作之意顯然。後來晉宋易代之際，劉裕控制的朝廷一再徵辟，陶淵明都拒不應命。因此他詩文對嵇康的引用，自然是深有會心的。這點正可見出陶淵明對嵇康的傾慕。陶淵明化用嵇康，並不止於上述一處，如〈停雲〉「枝條載榮」、〈時運〉「穆穆良朝」即分別出自嵇康〈贈秀才從軍〉「春木載榮」、「穆穆惠風」。此外還有不少，前輩諸家注釋中都已揭明，此處即不一一羅列。

其實陶淵明追慕嵇康風流的表現，早在年輕時所作的〈五柳先生傳〉中，已

<sup>9</sup> 蕭馳：《玄智與詩興：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21-222。

<sup>10</sup> 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山濤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5-236。

可尋繹其跡。傳文開篇即向嵇康遙遙致意。「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雖然遵循傳記的傳統格式，卻刻意「迴避」傳主的籍貫、姓字，自然是有心立異。不過日本漢學家一海知義先生敏銳地發現「這特異的『開場白』並不是陶淵明的獨創新作。傳為漢代劉向所作的《列仙傳》，或晉代嵇康、皇甫謐的《高士傳》等作品中已有不少類似的寫法」。而且，「嵇康把時常出現在陶淵明詩中的古代隱士榮啓期、長沮、桀溺、荷蓑丈人等人物作為『不知何許人』來加以介紹」。<sup>11</sup> 嵇康兄長嵇喜在《嵇康傳》中，曾說康「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sup>12</sup> 大概可以認為，陶淵明所選擇的撰述形式意味著他自覺地把「五柳先生」放在了嵇康所構擬的宇宙之內、千載之外高士傳統中，這應該視為陶淵明傾慕嵇康的證據。

接下來「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也讓人立即聯想到了嵇康，只是這一點也同樣為歷來學者所忽略。陶淵明宅院之中花樹眾多，「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是其明證。那為什麼此時的陶淵明偏偏選擇柳樹為號，而不選松樹、桃樹、木槿或其他的什麼樹呢？恐怕還是因為柳樹與嵇康的名士風流有莫大關係。《世說新語·簡傲篇》劉孝標注引《文士傳》云：「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sup>13</sup> 原來柳樹正是嵇康隱居傲世的象徵。後來庾信《思舊銘》中「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之語，<sup>14</sup> 正是將柳樹作為嵇康的代表，頗可反映南北朝文士的通行見解。

柳樹的身影頻繁見於中國文學中，撮其大要，有四種意象常常在漢魏晉時期被運用。一是時節的象徵，二是比喻人物風流態度，三與懷舊相關，四則是隱逸

<sup>11</sup> [日]一海知義著，彭佳紅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2-23。

<sup>12</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1《王粲傳》附《嵇康傳》裴松之注引，頁605。

<sup>13</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688。

<sup>14</sup>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89。

的標識。漢代《易緯通卦驗》：「立春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楊柳津。」<sup>15</sup>西晉傅玄〈陽春賦〉：「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燁而曜野，煒芬葩而揚英。」<sup>16</sup>東晉伍輯〈柳花賦〉：「步江皋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葉而雲布，揚零花而雪飛。或風回而遊薄，或霧亂而飄零。野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明。」<sup>17</sup>這是取柳樹為春天的表徵物候。東晉李顥〈悲四時賦〉云：「悲炎節之赫曦，覽祝融之御轡。遊井耀兮南離，晞辰凱之長吹。蔭綠柳之楊枝，雲鬱律以泉湧。」<sup>18</sup>則是夏日之柳。大概春柳嫩色，依依隨風，晚則柳絮如雪，最能表現春日妖嬈而迷離的景象。而夏日柳蔭深深，也很叫人愜意。詩人感四時遷流，最易取象於茲。

至於形容人物，《世說新語·容止篇》載：「有人嘆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之柳』。」<sup>19</sup>濯濯是明淨清朗貌，春日柳色，舒展而不繁密，輕盈而不滯重，以此形容，可以想象王恭的神采。又《南史·張緒傳》：「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sup>20</sup>晉人以王恭比楊柳，是柳勝於人；齊武帝以楊柳比張緒，則人物風流，似更在柳樹之上。

懷舊的柳樹則與曹丕和桓溫相關。曹丕〈柳賦序〉云：「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餘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左右僕御已多亡，感物傷懷，乃作斯賦。」<sup>21</sup>據王粲〈柳賦〉：「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屈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嘉木於茲庭。歷春秋以逾紀，行復出於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云云，<sup>22</sup>可知這株柳樹是曹丕從軍於官渡時所植，十五年後再次經行此地，感逝傷懷，有作斯賦。其賦有云：「餘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

<sup>15</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版），卷3，頁40。

<sup>16</sup> 同前註，頁44。

<sup>17</sup> 同前註，卷89，頁1534。

<sup>18</sup> 同前註，卷3，頁47-48。

<sup>19</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569。

<sup>20</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31，頁810。

<sup>21</sup> 《藝文類聚》，卷89，頁1533。按，其中「左右僕御已多亡」一句是嚴可均據李善《文選注》補入。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三國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4，頁1075。

<sup>22</sup> 同前註，頁1534。

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矍矍以遄徵。昔周遊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sup>23</sup>魏晉人物對生命有異樣的敏感，這是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常識，宗白華先生曾說魏晉人物特深於情，他們「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sup>24</sup>何況柳樹易於成活，又生長迅速，十五年足以扶疏婀娜，讓人有強烈的今昔之感，它進入曹丕的筆下也可謂必然了。這株令人傷懷的柳後來同樣出現在大將軍桓溫的身邊，從此留名青史，成就自己的不朽。這就是《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載的：「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sup>25</sup>曹丕再見柳樹的時候還沒有被冊立為太子，可以說功業未就吧。而桓溫也是希望建立不世功業的人，歲月流逝，通過柳樹表現出來，是何等觸目驚心。

最後，古典文學中隱逸之柳，應該說是肇端於嵇康，定型於陶淵明。《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人部隱逸類收錄了不少隱逸類的賦作，值得注意的是，收錄在前面的張衡、曹植、張華、陸機、陸雲等人賦作中都沒有特意提到柳樹。張衡、曹植時代柳樹似乎與隱逸無關，可不論。張華、二陸則都是相對純粹的儒家文人，不太受其時玄風的影響，作為玄學代表的嵇康應該不是他們的文化偶像，徐公持先生論兩晉文人嵇康情結的〈理極滯其必宣〉一文中也不曾提到他們。所以他們的作品也不大會看到嵇康的蹤跡。但是緊次陸雲之後，孫承的〈嘉遯賦〉則明顯受到了嵇康的影響。其賦有云：

有嘉遯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於洄瀾，臨崢嶸而式墜。淅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遯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於玄芒，任吉凶而靡錄。<sup>26</sup>

<sup>23</sup> 同前註，頁 1533-1534。

<sup>24</sup>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214。

<sup>25</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101。

<sup>26</sup> 《藝文類聚》，卷 36，頁 646。

孫承生平爵里不詳，其文在陸雲、謝靈運之間，其人當亦如此。賦中肥遁的是「玄人」，又賦多用玄字，已見其人是老莊之徒。全賦受嵇、阮的影響至為明顯，「長嘯」是阮籍所長，人所共知。單看嵇康，康詩〈贈秀才從軍〉多為賦化用，如「揮修綸於洄瀾」化自「垂綸長川」，「朝觀夷陸，夕步蘭渚」化自「朝遊高原，夕宿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鱖」化自「仰落驚鴻，俯引淵魚」和「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由此可以相信，賦中那「靡薜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正是從嵇康的庭院中搬來的吧。如無孫承之賦，似乎難以確信柳與隱逸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嵇康，而有此賦，則可以窺見晉人言及隱遯，已然結合嵇康與柳樹。張哲俊先生認為「陶淵明之前，隱士與柳並無特別的關係」，<sup>27</sup>程章燦先生在〈「樹」立的六朝——柳與一個經典文學意象的形成〉一文中也忽略了孫承之賦，因此同樣未能注意到陶淵明之前柳與隱逸依然存在的關係。<sup>28</sup>嵇康在兩晉文化領域擁有的崇高地位，他的一言一行莫不為人仿效，柳樹因他而與隱士生情，這是不難想像的。回到〈五柳先生傳〉，這位不求聞達的五柳先生，在庭中院外眾多的草木中獨獨鍾意於柳樹，他心中念茲在茲的不是嵇叔夜還能是誰呢？

正如懷舊感傷的柳樹從曹家柳變成桓家柳一樣，那蔭蓋隱逸之士的柳樹也從嵇家柳變成了陶家柳，而且由一株分作五株。文家勢利，從來如此。大概在南朝梁時，五柳已經成為淡泊隱逸的象徵。程章燦先生認為柳樹凝固成經典的文學意象是在梁時初步定型的，尤其是桓溫的金城柳和陶淵明的五柳，到這一時期成了文學中的熟典。<sup>29</sup>的確如此，梁元帝〈全德志論〉：「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即是明證。<sup>30</sup>庾信〈傷周處士〉：「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更是直接以五柳代稱隱士，可見此時五柳已經完全定型，遂成為後世詩文最常見的用語。相同意蘊的文學典故會有選擇與替代現象，一旦某一個典故被廣泛接受和運用，那麼其他近似典故會受到排擠。但被排擠者在早先存在過的痕跡仍然是可以尋覓到的。前引孫承與庾信〈思舊銘〉的例子說明，嵇康之柳與陶淵明之柳在彼時文學中是

<sup>27</sup> 張哲俊：〈陶淵明五柳的誤讀與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49。

<sup>28</sup> 程章燦：〈「樹」立的六朝——柳與一個經典文學意象的形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52-61。

<sup>29</sup> 同前註，頁56-57。

<sup>30</sup> 《藝文類聚》，卷21，頁646。



存在一定競爭的，因為陶淵明擁有比較單純的隱士身份，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鍾嶸《詩品》語），終究其「五柳」成爲隱逸的象征，而嵇康之柳則逐漸退讓，轉而單純作爲嵇康人格的象征物。

無論如何，陶淵明對嵇康的仰慕當可定論。顏延之〈五君詠·嵇中散〉「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論嵇康風神懷抱最得其肯綮。再看那個詠荆軻、詠精衛的陶淵明，便覺二人真是異代知己。嵇康〈贈秀才從軍〉其十八云：「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鑑，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此詩也可作陶淵明集的引論讀。

## 二、青松在東園

陶、嵇關係，草蛇灰線，仔細尋繹，自然可見。同樣的，陶淵明與孫綽、張湛的關係也是如此。如果說陶淵明少年時傾慕宛轉空靈的魏晉風流，因此結緣於柳的話，那麼隨著他生命的堅卓沉毅，他的風骨便轉而寄託到了松樹之上。畢竟，柳樹逢秋凋零，論堅凝的品性，就不如歲寒後雕的松柏了。「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凌霜猶茂。』」<sup>31</sup>柳樹縱然風流可愛，仍不敢與松相比，這是明證。

松之文學，淵源已久，《詩·小雅·天保》有「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魯頌·閟宮》有「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商頌·殷武》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山嶺之上，松姿特秀，相信這是每一個曾經登山賞松的人都會有的感受。顧愷之〈神情詩〉「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寒松」，<sup>32</sup>正是以山上青松作爲冬日的代表。冬天草木凋零，獨有松柏華茂，尤其大雪後，遠望山嶺，青白耀目。

松樹不但風姿秀美，其凌霜傲骨經孔子品題之後，更成爲君子品格的象徵。是以劉楨「亭亭山上松」、左思「鬱鬱澗底松」，都以松自喻。再如張華詩「松

<sup>31</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101。

<sup>32</sup> 《藝文類聚》，卷 3，頁 42。

生壘阪上，百尺下無枝……悲涼貫年節，蔥翠恆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袁宏詩「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榱桷麗，較爲梁棟桀」，<sup>33</sup>都是極寫松的磊落高潔。

山中松樹，常有逾千歲者，神仙家出，便以爲服食松脂、松子、松針等可以長生，可以成仙。今傳《列仙傳》中，記載偃佺、赤鬚子、犢子食松實，仇生食松脂，毛女食松葉。<sup>34</sup>而葛洪也明確將松柏脂列爲仙藥。<sup>35</sup>於是詩賦中的松樹又與神仙世界聯繫在了一起。如嵇康〈游仙詩〉有云：「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sup>36</sup>何劭〈游仙詩〉有曰：「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sup>37</sup>謝道韞〈擬嵇中散〉詩也說：「遙望山上松，隆冬不能雕。願想遊下憩，瞻彼萬仞條。」<sup>38</sup>三首詩都是因高山之松而起遊仙之思，這時松是仙人的象徵。而左芬〈松柏賦〉「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似乎真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淪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sup>39</sup>則又合君子與神仙的意象爲一，最能代表其時人心中的松樹形象。

以上所談都是自然生長的松樹，而人們也會人工種植松樹。《漢書·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sup>40</sup>這是取松堅勁之性以護持馳道。除此一例以外，漢魏晉時人種植松柏，似都在塚墓之前。按先秦早期似無隆塚和植樹的禮俗，所以《周易·繫辭下》和《鹽鐵論·散不足篇》中都稱古者「不封不樹」。但後世逐漸於陵墓前種植松柏。《漢書·東方朔傳》：「柏者，鬼之廷也。」顏師古注曰：「言鬼神尚幽闇，故

<sup>33</sup> 同前註，卷 88，頁 1513。

<sup>34</sup> 〔漢〕劉向撰，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1、36、101、109、132。

<sup>35</sup> 見〔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仙藥》（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 版），頁 196。

<sup>36</sup>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魏詩》，卷 9，頁 488。

<sup>37</sup>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影印清胡克家刻本），卷 21，頁 306。

<sup>38</sup> 《藝文類聚》，卷 88，頁 1513。

<sup>39</sup>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2 版），卷 28，頁 688。

<sup>40</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51，頁 2328。

以松柏之樹爲廷府。」<sup>41</sup>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清汪繼培箋引《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sup>42</sup>單看東方朔「柏者鬼之廷」之語，其鬼既可以指人鬼，也可以泛指地祇，但結合《鹽鐵論》和《潛夫論》之語就可以推知，塚墓種松柏之風，前漢時已經較爲常見，至後漢而愈盛。本來多植松柏還有炫富的嫌疑，再往後，就變成了一種孝道的表現。王隱《晉書》載：「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植松柏。」<sup>43</sup>

於是乎，松之文學又與死亡相關。〈古詩十九首〉其十三「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古詩〈十五從軍征〉「遙望是君家，松柏塚纍纍」，又阮籍〈詠懷〉其十三「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描寫的都是塚墓前的松樹。看到長青的松，想到故去的人，誰能沒有人生苦短、人命若朝霜的感嘆呢？長生之樹也是死亡之樹。松樹同時具有這兩個相反的象徵意義，正與訓詁中所謂「反訓」相合。

因爲漢魏晉時代，人們爲死者種松，久之就會產生避忌的心理，所以基本不會有人在庭園中植松，以爲大不吉利也。《世說新語·任誕篇》記載：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輓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劉孝標注引裴啓《語林》，也記有此事，或是《世說》所本。<sup>44</sup>張湛是東晉中期人，齋前種松，事入「任誕」，足見家園中種松在東晉時是聳人耳目的行爲。

以此爲背景，我們會驚奇地注意到陶淵明的〈飲酒〉其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絳塵羈？」這首詩以孤松自喻，顯然自置於君子人格的序列之中，但詩歌別有其特異之處，即青松在「東園」。

<sup>41</sup> 同前註，卷 65，頁 2845-2846。

<sup>42</sup>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137-138。

<sup>43</sup> 《藝文類聚》，卷 88，頁 1512。按，《類聚》僅云《晉書》，據《太平御覽》卷 953，知是王隱《晉書》。

<sup>44</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680。

所謂東園，當是陶淵明家中的東園。陶詩〈停雲〉第三章「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此處東園即淵明飲酒東軒外的園子。又〈飲酒〉其十五「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的描寫與「眾草沒其姿」也可以互相印證。東園屬於陶宅，應不錯。看來庭園中植松，似乎是陶淵明特別的喜好。那麼〈飲酒〉其十一所寫的「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看來也是坐在東園孤松之下，飲酒為樂。

不過陶淵明並非一開始就在家中種松的。〈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云「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詩中的青松仍然生長於遠山峰岩之上，並非陶公自植。〈和郭主簿〉詩前人多據其中「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一語及〈責子〉詩，推算第五子佟的生年，然後將本詩繫於晉安帝元興初（402 或 403）陶淵明居母氏喪期間，恐怕有誤。首先「弱子」只是幼子、稚子的意思，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幼時都可以被稱為弱子，斷定詩中的弱子是陶佟，武斷無據。其次自漢以後，人們居喪謹守儒家之禮，喪期不得飲酒、作樂，是最基本的要求。任誕如阮籍，雖然飲酒吃肉，卻其實深憂大慟於心，所以臨葬吐血。<sup>45</sup>陶淵明為人誠摯，孝友之情同樣發自肺腑。他為外公做〈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孝子之心，昭然可見。可是〈和郭主簿〉其一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其二云「銜觴念幽人」，美酒自斟，是服齊衰的孝子所為嗎？而且通觀全詩，何等的悠然自得、歡欣愉悅。居母喪而喜悅至此，實在是難以想象的行為。所以知前人有誤。按詩與郭主簿唱和，又云「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似乎這位郭主簿是從前的舊同僚，此刻淵明辭官在家，與之書札往還，詩歌唱酬（取楊勇先生說，以檢素為簡素，即書信）。那在辭官州祭酒之後的太元十九年（394）或太元二十年（395）較為可能。

由此可以知道，陶淵明年輕時還只是欣賞遠山之松。可到了寫〈歸去來兮辭〉的義熙二年（406）時，家裡已是「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那麼此前的陶淵明必然已經力排眾議，在庭院中種上松樹了。義熙四年（408）六月，辭官家居才兩年多的陶淵明遭遇回祿之災，家室蕩然。後來，陶公移居尋陽附郭的南村，〈飲酒〉

<sup>45</sup> 《世說新語·任誕篇》：「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658-659。

二十首即作於遷居南村之後。我們看這時陶公東園之松，可以掛以酒壺，又被眾草所沒，可知是遷居後新植的松樹，這時仍然幼小。雖然孤松小樹，但本質孤高，所以寒來霜降，詩人徘徊其下，把酒凝望，自然而意遠。五柳的風流已成往事，此時貞骨凌霜，託興已在孤松。

前文已經提到，張湛在屋前種松，時人以爲任誕，但這種駭俗的行爲大概也不是張湛的首創，而應該始於孫綽。《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載：「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sup>46</sup>今存孫綽〈秋日詩〉：「蕭瑟仲秋月，飄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詩言山居，正與隱居會稽東山寫〈遂初賦〉同一時期，又撫葉攀松都是「庭林」，所以大概詩中之松，正是孫綽齋前手種者。

孫綽的生年，曹道衡先生曾考訂在於晉愍帝建興二年（314），<sup>47</sup>陳慧娟女士則有詳考，認爲當在晉惠帝永寧元年（301），陳說可信。<sup>48</sup>南渡時，孫綽年紀在十歲左右。而據王曉毅先生考證，張湛之父張曠與孫綽爲同輩，但出生於江左，時間當在永嘉六年（312）之後，所以孫綽是張湛的父輩人物。又最早記載張湛事蹟的裴啓《語林》成書於隆和年間（362-363），那麼張湛成年後的放誕行爲只能發生在此前。<sup>49</sup>公元 301 到 363 年相差 60 年，扣除張湛成年的 20 到 30 歲的年紀，那麼，孫綽比張湛年長 30 至 40 歲。又據《晉書·孫綽傳》，孫綽隱居東山作〈遂初賦〉是在早年出仕之前，所以可以確信孫綽的種松早於張湛。

孫綽與張湛都是東晉玄學的重要人物，孫綽尤其有名。《晉書·孫楚傳》附綽傳稱：「綽少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嶠）、王（導）、郗（鑒）、庾（亮、冰）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sup>50</sup>檀道鸞《續晉陽秋》則稱許詢和孫綽的玄言詩「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sup>51</sup>鍾嶸《詩品》也說

<sup>46</sup> 同前註，頁 124。

<sup>47</sup> 曹道衡：〈晉代作家六考·孫綽〉，《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90。

<sup>48</sup> 陳慧娟：〈孫綽生平考〉，《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頁 13-29。

<sup>49</sup> 王曉毅：〈張湛家世生平與所著《列子注》考〉，《東岳論叢》2004 年第 6 期，頁 166-170。

<sup>50</sup> 〔唐〕房玄齡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56，頁 1547。

<sup>51</sup> 《世說新語·文學篇》「簡文稱許掾」條劉孝標注引。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245。

「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sup>52</sup>陶淵明受到玄學的深刻影響，是人所共喻的。<sup>53</sup>但由他效法孫綽與張湛種松的行爲，可以推測，陶公在玄學人物中，可能對孫、張較爲心儀，而受其影響。

孫綽是玄言詩大師，錢鋼先生曾分析以孫氏詩爲代表的玄言詩美學的三重品格，即「以說玄理以言情志」、「人格的內在超拔」、「理感賞心」，最是恰當。<sup>54</sup>這三種特徵，在陶詩中都有明顯地體現。陶詩多理語，更有哲理詩〈形影神〉三首。雖然自有趣味而不再「平典似《道德論》」，但淵源毋庸置疑。

論人格超拔，需要稍加說明。孫綽在當時，有「穢行」之名，<sup>55</sup>這固然因爲孫氏常托藉盛流，高自標榜，但恐怕也與太原孫氏門第不算高顯，強自攀附，不免爲當時最高門第的庾、褚、王諸氏所鄙有關。<sup>56</sup>但孫興公因寄興青松，便手自培植，而於他人怪異的目光夷然不顧，仍是追求人格的超拔之美；<sup>57</sup>同時他頗具慧識，品評人物，能得肯綮，《世說新語·賞譽篇》載其月旦人物之語不少，足見其當時影響。又孫氏面對洪族，或有媚態，但立身朝堂，仍具傲骨。《晉書》本傳載桓溫欲遷都洛陽，以漸行篡奪之事，「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這時孫綽第一個公開上疏反對，雖觸桓溫之怒而不顧。撰《晉書》的史臣也不禁稱讚孫綽「獻直論辭，都不徇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sup>58</sup>所以孫綽也許未必是陶淵明的「偶像」，但應該仍在某些方面獲其欣賞。陶淵明辭州祭酒、彭澤令，屢經徵辟而不應，傲對檀道濟，風骨最爲人稱道，不知道他倚寒柯而遠望，倚孤松以盤桓時，懷古所念的，是否也有同樣愛松的孫興公呢？

至於「理感賞心」，孫綽曾稱讚庾亮「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

<sup>52</sup>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版），頁511。

<sup>53</sup> 詳參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第四章〈老莊玄學與陶淵明〉，頁133-197。

<sup>54</sup> 錢鋼：〈東晉玄言詩審美三題〉，《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頁32-38。

<sup>55</sup> 《世說新語·品藻篇》：「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劉孝標引《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476。

<sup>56</sup> 說見張蓓蓓：《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246-247。

<sup>57</sup> 晉人本有「人格的唯美主義」，宗白華先生論之已詳。參見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頁208-226。

<sup>58</sup> 《晉書》，卷56，頁1545、1548。

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sup>59</sup>「玄對山水」一語，可以作晉人文學以及晉以後山水、田園詩的宗旨看。他在〈天台山賦〉中又說：「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sup>60</sup>通過虛靜忘我的方式消除主客對待，將客觀的自然內化為審美對象，為後人的自然審美開闢道路，這已是今人的共識。孫綽置身此潮流中，而能總結成辭，表而出之，無愧宗師。陶淵明後來採菊望遠，悟真忘言，其中玄心，無異前輩。

陶淵明的創作遠遠超越了玄言詩，但卻不妨生於玄言詩的風氣中。他東園種松，同於孫綽，所作陶詩〈和郭主簿〉其二、〈己酉歲九月九日〉，其風調也近於〈秋日詩〉，草蛇灰線，承傳之跡隱隱可見。

除了孫綽，張湛對陶淵明的影響也是可以考知的。張湛傳名後世，主要依靠他整理註釋的八卷《列子》。他自述，祖父張嶷攜《列子》書南渡，到江南僅剩三卷，在親友家搜求補錄，復得完整的八卷。張湛即據此作注。<sup>61</sup>考《隋書·經籍志》，六朝人注《列子》的似只有張湛一家，那麼陶淵明能看到的《列子》應該就是張氏注本。朱自清先生曾據古直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統計「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並感嘆說「《列子》書向不及《莊子》煊赫，陶詩引《列子》竟有這麼多條，尤為意料所不及」。<sup>62</sup>這足見《列子》對陶淵明的影響。以思想而言，陶淵明也頗有與張湛相合處。如牟鍾鑒先生指出：「在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上，王弼主張名教以自然為本，郭象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列子》主張任自然而忘名教，張湛則主張任自然而順名教。」<sup>63</sup>陶淵明主任運委化，源於玄學，而立身處世，又多儒者氣象，而最為宋儒稱道，所以在玄學諸家中，最近於陶的正是張湛。又張氏《列子·力命篇》題注云：「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sup>64</sup>不主養生，不主立善，這也正是陶淵明〈形影神〉組詩大旨。張、陶的契合，原非種松一端，

<sup>59</sup> 《世說新語·容止篇》「庾太尉在武昌」條劉孝標注引。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562。

<sup>60</sup> [晉]孫綽：〈天台山賦〉，《文選》，卷 11，頁 166。

<sup>61</sup> 見[晉]張湛：〈列子序〉，[周]列子撰，[晉]張湛注，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附錄，頁 278-280。

<sup>62</sup>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 3，頁 6。

<sup>63</sup> 牟鍾鑒：〈對《列子》的再考辨與再評價〉，《文史哲》1986年第 5 期，頁 51-52。

<sup>64</sup> 《列子集釋》，頁 192。

而由種松之事，正可推見陶公對張湛的欣賞。

陶淵明效仿孫綽、張湛，東園種松，其事風雅，當補入陶淵明傳中，並收入《世說新語》，當時人失載，便讓陶公韻事，沉埋千載。明乎此，則〈飲酒〉其八之意味，在高潔之外，又多出一種灑脫兀傲。

### 三、附論〈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時間

〈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時間，歷來是有爭議的，將柳與松聯繫起來思考，也許是解決該問題的一個新視角。

今存陶淵明傳記，最早的是《宋書·隱逸傳》中本傳和蕭統〈陶淵明傳〉。二傳都認為〈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出仕前的作品，但今天有些先生認為應作於晚年。<sup>65</sup>無論是少作說還是晚作說，因為沒有確證，都只能推測。目前論證晚作說最詳盡的是魏耕原先生。魏先生提出的理由包括文字純熟、語氣似晚年、老人好回顧人生等，並認為陶淵明作傳的緣由是要拒絕檀道濟的逼仕，而宋代史臣為陶淵明作傳時對這種不合作的態度「深為之諱」，所以故意把〈五柳先生傳〉歸於少作。<sup>66</sup>

趙翼指出，《宋書》是沈約根據徐爰的舊史加工編撰的。為宋諱是自然之事。<sup>67</sup>但是，需要隱諱的都是篡奪殺戮的醜事，劉裕君臣對陶淵明既然以禮相待，陶仍拒不出仕，對雙方來說都是美談，當大書特書才對，何須隱諱？對於古人的記載，如果沒有有力的證據，無法輕易否定。大概陶淵明的傳記就是徐爰所作，再由沈約採入《宋書》。徐爰，劉宋史官，能看到朝廷檔案，《宋書》陶傳稱〈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魏先生等的理由都是主觀感受，筆者的主觀感受就不同於晚年說的諸先生。其實〈五柳先生傳〉全文風調灑脫恬淡，與陶詩「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的記述相一致，而晚年自述則往往有悲苦無奈之音。而這篇自傳瀟灑自在、放達任真，很像是還未經歷人生的苦難的青年人

<sup>65</sup> 如遼欽立《陶淵明集》、鄧安生《陶淵明年譜》、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魏耕原《陶淵明論》等，都作晚年說。

<sup>66</sup> 見魏耕原：《陶淵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十五章，頁243-254。

<sup>67</sup>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9，「宋書多徐爰舊本」、「宋書書晉宋鼎革之際」條，頁179-181。



的自我期許。至於老人好回憶，固然，但少年人寫自述文的從來都不在少數，這恐怕難以成爲理由。

如果再結合陶淵明與柳與松的關係來看，恐怕還是少作說更近實。如前所述，陶淵明隨著閱歷的增加、人生體悟的深切，晚年越來越將情懷寄託在孤松之上。古人的這種寄托比較專一，竹樹之中，一般選定一種，便如戀人一般，朝夕相對。王子猷、蘇子瞻、文與可等之於竹，正如孫綽、張湛之於松。柳的風流翩翩，恐怕還是更讓青年陶淵明動心。所以年輕時做的是〈五柳先生傳〉，晚年要做的話，也許就會叫〈孤松先生傳〉吧。而且陶公晚年有專門詠松的詩，卻不見專門詠柳，甚至基本不會再提及柳樹。〈歸園田居〉中「榆柳蔭後簷」，是歸隱次年做的，而且一帶而過。唯一可能作於晚年而提及柳樹的是〈擬古〉其一「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之句，但其詩不過模擬〈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用以起興，也非專門詠柳。總體而言，目前恐怕暫無確切地證據反駁古人的少作說。

#### 四、結語

陶淵明與嵇康、孫綽、張湛的關係，是過去學者較少注意的。實則論陶淵明與魏晉玄學的關係，不但可以論其大體，也可以具體落實到他的文化偶像及其具體影響。過去學者較多關注到阮籍和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阮籍的影響，〈詠懷詩〉的創作模式大於玄學。孟嘉的風度影響及於陶淵明也顯然可見，但陶淵明如何看待其他更有代表性的玄學人物？又是如何受到他們的影響呢？他的魏晉風度是如何與前輩勾連的呢？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些解答。

此外，柳與松的文化史、文學史中，陶淵明有其獨特的地位與貢獻。五柳意象的凝固源自陶淵明，正文中已述及。而陶淵明對松的貢獻恐怕更大於柳。本來在庭院中種松是不吉利的，但後世文人企慕陶淵明，齋前園中種松便也逐漸成爲風雅的象徵。唐代詩人，尤以愛慕陶淵明的白居易好寫庭園中松樹。白詩〈松齋自題〉「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松聲〉「月好好獨坐，雙松在前軒」，〈春葺新居〉「栽松滿後院，種柳蔭前墀」，〈栽松〉「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等等甚夥，可謂開卷盈目。又錢易《南部新書》載晚唐「鄭少師薰於里第植

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sup>68</sup>種松既詩法淵明，以七松對五柳，尤見風流。總之，陶淵明之於松，不但貢獻典故而已，也實際影響了後代園林的發展，這也是值得後人感念的。

---

<sup>68</sup> [宋]錢易撰，黃壽成校點：《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戊集，頁65。

## 引用文獻

- 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王曉毅：〈張湛家世生平與所著《列子注》考〉，《東岳論叢》，2004年第6期，頁166-170。
-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牟鍾鑒：〈對《列子》的再考辨與再評價〉，《文史哲》，1986年第5期，頁48-54。
-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余敦康：《魏晉玄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徐公持：〈理極滯其必宣——論兩晉人士的嵇康情結〉，《文學遺產》，1998年第4期，頁36-45。
- 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山濤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版。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陳慧娟：〈孫綽生平考〉，《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3-29。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張哲俊：〈陶淵明五柳的誤讀與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48-55。
- 張蓓蓓：《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 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版。
- 逸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程章燦：〈「樹」立的六朝——柳與一個經典文學意象的形成〉，《北京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52-61。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版。

蕭統撰，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蕭馳：《玄智與詩興——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錢易撰，黃壽成校點：《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錢鋼：〈東晉玄言詩審美三題〉，《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頁32-38。

戴明陽：《嵇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魏耕原：《陶淵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版。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一海知義著，彭佳紅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Five-Willow and Lone Pine: *Tao Yuanming's* cultural icon and Wei Jin demeanor

Liu, Y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 Yuanming and Ji Kang, Sun Chuo, Zhang Zhan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Ji Kang can be seen as the “Cultural Icon” of Tao Yuanming, and Tao’s preferences for willow was derived from Ji Kang. However, it can also be argued that Tao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Sun and Zhang, which is the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for his planting of pines in his homestead. The belief that the willow represented seclusion during the thousand years after his death can attributed to the work of Tao, while the planting pines in one’s homestead changed the perception of pines from one of being unlucky to one of elegance. By studying the willow and the pine, we are able to gain further insights on the specific influence which Ji Kang, Sun Chuo and Zhang zhan had on the life of Tao Yuanming, specifically the influence on his literary works and his beliefs. Finally, review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o and the willow and the pine, it can be argued that *A Biography of the Five-Willow Gentleman*, was written by Tao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is life.

**Keywords:** Five-Willow, lone Pine, Ji Kang, Sun Chuo, Zhang Zh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